

·历史学研究·

“华夷之辨”与清代朝鲜的事大政策

尤淑君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1627年,朝鲜被迫叛明降清,成为清国的属藩。1644年清军入关后,朝鲜在政治上虽奉行事大政策,但事大政策已不再是朝鲜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而是与清帝国互换利益的权宜之策。朝鲜事大政策的分裂化,使朝鲜内部强调“华夷之辨”,发展出自尊自傲的文化认同,遂标榜朝鲜为“小中华”,借以证明朝鲜已继承中华文化之正统地位。后来,由于清帝国国力强盛,朝鲜君臣也逐渐认同清帝国的宗主地位,而主张向清帝国学习的朝鲜“北学派”也趁势而起,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也越来越稳固。但从朴趾源暗示“天下可图”一语,可知明清易鼎的世变,象征以“中华”为主的文化纽带就此断裂,东亚诸国发展出自成一体的文化认同,不再以清帝国作为中华世界秩序体系的中心。

[关键词] 事大政策;尊周思明;华夷之辨;天下秩序;宗藩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5]04-0092-13

一、前言

朝鲜王朝(1392—1910)立国之初,太祖李成桂(1335—1408)就定下“事大”政策,即在政治上效忠明帝国,在文化上尊儒抑佛、学习中华文化,并多次派使臣出使明帝国,后经明太祖朱元璋示意,获赐国号为“朝鲜”,成为明帝国最为重要的属藩国。^①此后,在“事大”政策的影响下,朝鲜每每遣使岁贡,争取明帝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支持,并以模仿明朝典章制度为能事,“我国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②,使朝鲜君臣将朝鲜看成中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有意识地推崇箕子,赋予极高的地位,再将李成桂比附为箕子,进而解决朝鲜王朝政权正当性的问题。^③在明、清易代嬗变的期间(1616—1644),朝鲜在明金对决上占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④,可见明帝国与朝鲜唇齿相依的关系。同样的,金国若占有朝鲜,便可避免双线作战的危险,并吸取朝鲜的人力与物资,保障金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因此,为了剪除明朝羽翼,金国两次出兵朝鲜,直抵国都,要求朝鲜君臣投降、谢罪称臣,变成金国属藩,向金

收稿日期:2015-02-03

作者简介:尤淑君,女,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资助项目“清代华夷观与天下秩序原理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3YJC770061)、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清代华夷观与天下秩序原理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Y201329426)、浙江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紫金计划“清代的华夷观”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明太祖实录》卷223,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版,第3267页。李成桂虽努力靠拢明帝国,但因李成桂篡夺高丽幼主之位,故洪武帝朱元璋始终不承认李成桂王位的合法性。参见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②[韩]姜希孟:《私淑斋集》,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2册,서울市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卷8《送郑都事赴黄海幕下序》,第112页。值得注意的是,事大国策并未形成具体的教旨或官方文书,但从姜希孟的说法,可知朝鲜政府一贯奉行事大政策,并行诸于朝鲜典章制度与风俗文化之中。

③[韩]郑道传:《三峰集》,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서울市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卷7《国号》,第414页。

④[韩]黄景源:《江汉集》,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서울市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卷27《明陪臣传一》,第28页。

国进贡大量米粮、马匹、贡品。^①即使被金国征服后,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暗中与明帝国潜通往来,试图泄露金国情报。明朝灭亡后,清军入主中原,但因“华夷大防”思想的影响,朝鲜仁祖仍不承认清政府的正统地位,并坚持“尊明事大”,试图与南明政权、台湾郑氏政权往来,互通情报。^②

“华夷之辨”即以是否坚持礼乐政教,作为判别华夏、蛮夷的标准,诸夏若放弃礼乐便沦为夷狄,夷狄接受礼乐就升为华夏,并主张用华夏礼乐教化“蛮夷”,实现“华夷一家”,正如韩愈《原道》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③随着中国文治武功的强大,东亚诸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华夷之辨”的概念也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④在明帝国的统治下,朝鲜与女真皆臣服于明帝国,朝鲜与女真的关系即是在大中华世界秩序体系下的小中华秩序体系,^⑤朝鲜一直将女真部落看作是“夷”、“胡”等落后者,并在双方交往过程里,朝鲜处于主动的支配地位,女真则处于被动的被支配地位。^⑥朝鲜对明帝国“事大以诚”,学习明朝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自号“小中华”,故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部落未受中华文化的教化,自然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落后部族。当金国崛起,朝鲜被迫投降,多有怨恨,并在政治上依旧认同明朝,不愿臣服清政府。清军入关后,剃发胡服,废弃汉人衣冠。根据“华夷之辨”的论点,朝鲜、日本、安南等周边诸国认为中国已改用“夷礼”,应该“夷之”,即“华夷变态”,^⑦而这些国家只要接受华夏礼乐,自然可以“中国之”,替代中国成为天下之主。因此,朝鲜对清政府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如朝鲜仁祖屡次称病不迎接清使,使清使大发脾气,而朝鲜孝宗也主张雪耻复仇,提倡“北伐”,积极整顿朝鲜军队,与南明、台湾郑氏政权及日本接触,寻求反清的机会。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收回台湾、结束郑氏对台湾的统治后,明朝残余势力基本被消灭,朝鲜才基本结束“北伐”的计划。

台湾学界较早关注清代中朝关系的研究,如李光涛依据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写成《朝鲜国表文之研究》,分析了朝鲜与明清帝国往来的表文、文书程序及清帝国对朝鲜表文用字的责问等问题,并首先使用朝鲜王朝的档案史料,写成《多尔袞征女朝鲜史事》,有助于理解清初的中朝关系。^⑧张存武的《清韩宗藩贸易》和《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侧重于中朝两国宗藩体制的构建、运作及变通问题,并分别考察朝鲜官方朝贡与民间边市贸易的发展规模,及其对清帝国与朝鲜经济的影响。^⑨刘家驹、陈捷先、庄吉发针对皇太极时期明帝国、金国、朝鲜三方关系,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探讨金国崛起的多种原因。^⑩林明德、林子候、张启雄则关注近代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并分析西方国际法的外交体制与传统宗藩体制的理论冲突。^⑪199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如陈尚胜以朝鲜使者出使明朝和清朝的笔记《朝天录》和《燕行录》为基本资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朝鲜王朝对于明清帝国的不同观感。^⑫高伟浓以近代朝鲜

①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

②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96页;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1页。

③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④[日]堀敏一:《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中国と周辺国家》,春秋社1977年版;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⑤[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费正清根据1840年以前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与手段,指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汉字圈(Sinic 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及日本为代表;内亚圈(InnerAsian Zone),以蒙古、西藏、中亚的游牧民族地区为代表;外圈(Outer Zone),以俄罗斯、苏禄、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代表,表示不接受中华文化之地区。

⑥[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年版。

⑦参见[日]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东京东洋文库1958年版;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孙文:《〈华夷变态〉研究》,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⑧参见李光涛:《朝鲜国表文之研究》,《中央研究院院刊》第2辑;李光涛:《多尔袞征女朝鲜史事》,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版。

⑨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研院近史所1985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⑩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陈捷先:《论天聪年间后金与朝鲜的关系》,载《清史杂考(六)》,学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8页;庄吉发:《清太宗嗣位与朝鲜丁卯之役》,载《清史论集(四)》,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0页;庄吉发:《满鲜通市考》,《清史论集(七)》,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林子候:《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玉山书局1990年版;张启雄:《中韩宗藩关系をめぐる袁世凯の名分秩序观》,载[日]山室信一编:《日本・中国・朝鲜間の相互认识と误解の表象: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討議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年版,第39-58页。

⑫陈尚胜:《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为例,分析清代宗藩体制变革失败、走向崩解的时代背景,列强干预及其制度性因素。^① 黄枝连考察朝鲜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提出“天朝礼治体系”一说,并指出朝鲜的“小中华”意识由来已久,但因乾隆皇帝的优礼,使朝鲜全面接受清帝国的统治。^② 韩国学者全海宗透过比较历代中朝两国往来情况,认为儒家德治主义理念到明清时期转化为禁止朝贡以外的来往、抑制中国文物外出的文化闭锁主义,并指出清代中朝宗藩体制最为成熟,清帝国要求朝鲜进贡的经济负担较元明两代轻松许多,而朝鲜与清帝国维系宗藩关系的主因乃出于政治考量,并非经济获利或文化交流。^③

过去学者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梳理了清代中朝宗藩体制的运作情况,奠定了清代中朝关系的研究基础,但受当时史料、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较少使用,如《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燕行录》、《韩国文集丛刊》等朝鲜方面的档案、记录及文集,多少有“偏信则暗”之弊,也容易忽略朝鲜政府的主动性,或将中朝宗藩体制化约为利益交换的朝贡贸易,未能立体地观察中朝宗藩体制的性质和变化。近年来,随着大批朝鲜《朝天录》、《燕行录》与日本《朝鲜通信使记录》等资料的出版与利用,中朝关系与宗藩体制的研究得以继续深化,如宋慧娟探究了古代宗藩关系的形成因素,并分析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发展、变化及破裂的内外因素。^④ 刘为也考察了清代中朝使者的往来情况,有助于理解中朝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⑤ 日本学者夫马进(Fuma Susumu)、大陆学者葛兆光通过对《朝天录》与《燕行录》进行分析,可知早在16世纪明代中叶,朝鲜君臣对华认同已有变化,开始质疑事大政策的必要性,批判明帝国的诸多弊端,而1644年明清交替的变局更加剧了朝鲜认同改变的力度。^⑥ 孙卫国也考察清代朝鲜对华观,指出费正清“朝贡体系”模式的不足,并透过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实践及其对朝鲜官民的影响,认为朝鲜始终抗拒清帝国的统治,在文化上从未真正认同清帝国。^⑦ 韩国学者郑玉子也提出“朝鲜中华主义”的概念,强调朝鲜在明朝灭亡后,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是蛮夷、不足为天下之共主,唯有朝鲜能继承明朝正统,复兴中华文化,传承儒家道统,并作为当时东亚世界的文化中心,故称为“小中华”。^⑧ 杨雨蕾详述朝鲜华夷观的演变及北学派的兴起,并指出洪大容“华夷一也”的观点奠定了北学思想的基础。^⑨ 刁书仁、李英顺、徐云飞等人也透过洪大容的思想讨论,分析朝鲜北学派及其华夷观的变化,并指出华夷皆是正界,动摇了当时朝鲜“华夷之辨”与“小中华”主流思想的基础,试图弥合朝鲜事大政策在政治与文化分裂的鸿沟。^⑩ 陈尚胜、苗威也透过乾隆年间的朝鲜贡使团纪录,指出若干朝鲜士人倡导“北学论”,主张朝鲜应学习中国文化,朝鲜才逐渐从心理和情感上接纳清朝。^⑪ 柏松考察朝鲜王朝的“华夷观”的变化,并结合明清时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动情况,分析朝鲜王朝“华夷观”的特点、具体影响及其思想资源。^⑫

综上所述,可知朝鲜虽是清帝国的属藩,在政治上虽奉行事大政策,但在文化上却不再认同清帝国为天下之主,并坚持“尊周思明”的文化政策,强调“华夷之辨”,证明朝鲜已继承中华文化之正统地位,也能与清帝国互争“天下”,成为天下之共主。然而,自明末清初以来,朝鲜王朝秉持的“反清复明”思想在何时出现变化,历代朝鲜国王对清帝国的态度与事大政策有否差异? 有鉴于清代中朝关系的两重性,本文以朝鲜王朝的角度切入,考察清代中朝宗藩体制与朝鲜事大政策的关系,并根据部分《燕行录》,分析朝鲜君臣的“华夷观”

①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254页。

②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350页;黄枝连:《朝鲜的儒化情景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242页。

④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日]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⑦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⑧[韩]郑玉子:《조선 후기: 조선 중화사상연구(朝鲜后期:中华思想研究)》,서울특별시—志社1998年版,第4、12、22、96-99页。

⑨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245页。

⑩刁书仁:《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李英顺、金成镐:《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东疆学刊》2006年第1期;徐云飞:《洪大容实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历史系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⑪陈尚胜:《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韩国学报》2000年第16期;苗威:《华夷观的嬗变对朝鲜王朝吸收中国文化的影响》,《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⑫柏松:《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华夷观”探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与“尊周思明”内在理路的联系,进而探讨朝鲜事大政策、“尊周思明”及其与清帝国往来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有助于理解朝鲜事大政策与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因素。

二、朝鲜叛明降清的无奈

根据河内良弘的研究,可知明代女真诸部视朝鲜为上国,而朝鲜也视女真为属藩,朝鲜与女真的关系即是在大中华世界秩序体系下的小中华秩序体系,但朝鲜与女真却不是真正的宗藩关系,只是在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的支配地位,女真则处于被动的被支配地位。^①因此,朝鲜认为女真是未开化的夷狄、胡虏,始终瞧不起女真,两者关系时好时坏,朝鲜具有控制女真的实力。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1559—1626)叛明称汗,建立金国,建元天命,掠明朝、朝鲜物资以养民富民。当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光海君李瑈(1575—1641)试着调整对女真的策略,让大臣们讨论是否继续“事大政策”、与金国交邻议和,却引起朝鲜内部的政争,有些官员甚至不惜挂冠离去,以示抗议。^②在官员与儒生的反对下,光海君强行推动与女真友善的政策,却落得众叛亲离,使绫阳君李倬(1595—1649)趁机引发宫廷政变,光海君惨遭废黜幽禁。在士林与西人派的支持下,李倬即国王位,史称“仁祖反正”。^③仁祖李倬主张亲明排金政策,全面否定光海君的政策,重新回到以名分为本的“事大尊明”外交路线,与金国断绝关系。

朝鲜转变对外政策后,让金国大为反感,尤其是朝鲜协助毛文龙(1576—1629)牵制金国之事,^④更令金国感到芒刺在背,认定必须先制服朝鲜,解决毛文龙,才能专心对付明朝。因此,皇太极(1592—1643)即金国汗位后,命阿敏(1586—1640)等人率三万余骑攻击毛文龙,顺便往征朝鲜。^⑤阿敏的军队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很快就攻下义州、安州、平壤等地,仁祖李倬携王妃、世子撤退到江都(江华岛),命姜弘立(강홍립, 1560—1627)之子姜璫(강속)等人前往金国军营,与阿敏等人谈判议和。^⑥金国使者刘兴祚(?—1630)要求朝鲜国王派宗亲赴军营重议盟誓条款,^⑦并接受阿敏贝勒提出的条件:“贵国实心要和,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邻国相近,何惧之有?果如此议,我两国告天誓盟,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⑧。对于阿敏提出的要求,朝鲜君臣同意以金为兄,但不愿意切断与明朝的交往,并主张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乃“大义所系”,绝不同意背弃明朝。^⑨面对金国军队步步逼近,朝鲜君臣还在争论如何接见金使的礼仪,不断有官员奏请斥和,仁祖李倬指出和议是“今此羁縻之道,乃是缓敌之策”^⑩,才止住浮议。为了拖延议和之事,李倬要求金使让金国回兵后再议和,同意派晋原君姜嫄随同金使回营,^⑪并在国书覆称朝鲜:“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名分已定,敢有异意”^⑫,试图说服金国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两者可并行不悖,希望能保留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朝鲜使者原昌君等人与诸王会见时,与八旗诸大臣并列站立。阿敏贝勒坐在衙门内的床上,其他五个台吉各坐一边。原昌君从侧门进入,向阿敏行一叩头礼,又行抱见礼、抱阿敏膝相见,并与其他五位台吉行抱见礼,才呈上朝鲜国书。^⑬阿敏不满朝鲜国书仍用天启年号,认为金国并不是明朝属臣,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要求朝鲜改用天聪年号。^⑭朝鲜君臣坚决不肯去去年号,并改用明朝揭帖文书不书年

①[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年版。

②[韩]赵庆男:《续杂录(一)》,载《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2辑)》,史部第9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韩]李元淳等著:《韩国史》,詹卓颖译,幼狮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14页。

④李光涛:《毛文龙攘乱东江本末》,载《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

⑤庄吉发:《清太宗嗣统与朝鲜丁卯之役》,载《清史论集(四)》,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7页。

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国史编纂委员会1981年版,第17页a。

⑦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译著·清太宗朝(一)》,第176页(《旧满洲档》第2630页):“刘副将(兴祚)说:你们若要解决这事,你如有亲生儿子或亲弟可遣一人来,并由你亲口保证,每年如何进贡你们国家所产财物家畜,如此事竣后,我们就班师。朝鲜汗(王)李倬说:昔春秋之时,以城下立盟为耻,你们若真心行大义,应当退兵而议和啊!刘兴祚说:你再这样说长话,迟一天则你的百姓多受一天苦,迟两天则百姓多受两天的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你的百姓啊!送你的弟弟来,你应誓告天地,事竣后,我即尽速退兵啊!”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22页b。

⑨[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22页b。

⑩[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25页a。

⑪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译著·清太宗朝(一)》,第176页(《旧满洲档》第2631页)。

⑫[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25页b。

⑬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译著·清太宗朝(一)》,第176页(《旧满洲档》第2631页)。

⑭[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41页a。

月的方式,阿敏才不再纠缠年号问题。^①金使刘兴祚请照明朝与蒙古议和仪式,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方足以表诚信。但朝金双方又因誓盟的问题,朝鲜国王以母丧三年内不杀生为由,拒绝与金国誓盟,使谈判几乎破裂,刘兴祚甚至威胁朝鲜官员说:“不杀二畜,使生灵屠戮殆尽,可乎?”^②几经交涉,最后双方都各退一步,朝鲜国王仍依明朝礼制,穿戴翼善冠黑袍乌带、在殿上亲行焚香告天礼,而朝鲜三议政、六部尚书吴允谦、李廷龟等人与金使刘兴祚依照金国礼制,刑牲告誓,盛血、骨、酒、肉各一碗,再宣读誓文“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③,方完成誓盟仪式。但阿敏认为朝鲜毫无诚意,遂借口自己未参加誓盟仪式,所以还兵时分三路纵兵大掠三日,^④并在平壤与朝鲜君臣再行誓盟之礼,要求朝鲜应送金国汗礼物、尊重金国使者、不可收留逃人,否则将告天地、再征朝鲜。朝鲜只能接受,并向明朝报告丁卯虏祸的经过。^⑤

从江都之盟到平壤之盟的盟约内容,可知江都之盟并没有要求朝鲜臣服的条款,大体上仍保全了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金朝双方是对等的兄弟之国,双方各有应尽的义务与权利。但平壤之盟有许多强迫朝鲜的单方面要求,^⑥尤其是“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一语,隐含与明朝互别苗头、视朝鲜为属藩的意思。^⑦正因为平壤之盟的名份问题,使金国与朝鲜屡为礼仪问题冲突,在双方的往来文书中也常争执称谓、用词等细节,显示金朝双方对盟誓的认定不一,金国以平壤之盟为金朝双方的正式盟约,朝鲜则否认平壤之盟的正当性,而以为江都之盟才是金朝双方的正式盟约,所以金朝双方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不同,容易为使者的接待规格屡生龃龉,也在文书往来上容易出现名份之争。例如,皇太极遣使责问为何朝鲜高官下马迎送明朝使者,但迎送金国使者只是马上相揖而已。^⑧又如,朝鲜传递文书给金国时,一开始用下对上的“奉书”,后来改用平行“致书”字样,使皇太极大为不满,遣使诘问:“何王往日来书俱有奉字,近年来不写奉字,只书致字,岂予微弱,显见王之轻我耶”^⑨。仁祖李倧虽回书解释朝鲜并无轻视之意,但强调朝鲜与金国是对等的邻国,“致与奉两字,均为邻国相敬之称”^⑩,所以不存在轻视金国的问题。

仁祖李倧的辩解并没有说服皇太极,皇太极需要朝鲜更进一步的表态,遂要求朝鲜国王遣亲近子弟前往金国,进贺获玺、劝进帝号,迫使朝鲜不能再走“双边外交”的路线,必须在明朝与清国间做出抉择。^⑪对此,朝鲜君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崔鸣吉(최명길, 1586—1647)为首的少数人主张议和,着眼现实利益,建议先承认清国国号与皇太极的帝号,虚如委蛇,以拖待变,避免开战。^⑫而大多数官员都主战斥和,坚持“尊中国攘夷狄”为朝鲜立国之本,^⑬维系与明帝国的君臣名份,甚至指出金国就是想利用朝鲜的臣服,切断朝鲜与明帝国的宗藩关系,建立皇太极称帝的正当性基础,届时“将以称于天下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面目立天下乎”^⑭。朝鲜内部的斥和势力极大,激烈抨击崔鸣吉为奸臣,使仁祖李倧决定拒见来使、拒受来书,使金国使者忿然而返。正在朝鲜犹豫不决之际,皇太极以朝鲜渝盟、使者不下拜为开战借口,亲征朝鲜。清兵迅速攻至汉城、江都,还俘虏了朝鲜王妃、王子,仁祖李倧只能遣使议和,出城投降。

1627年(天启七年,崇德二年,仁祖十五年),仁祖李倧率世子、文武百官出城谢罪,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

①[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42页a。

②[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47页a。

③[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5,第50页a。

④《清太宗实录》卷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页b。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16,第1页a。

⑥《清太宗实录》卷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a。

⑦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6页。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7,第17页b。

⑨[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1,第76页a。

⑩[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1,第76页a。

⑪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04页。

⑫[韩]赵庆男:《续杂录(七)》,第11页a;[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3,第37页a。

⑬[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卷53,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版,第2页。

⑭[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2,第8页b。

礼,双方立下三田渡(麻田浦)之盟:^①朝鲜同意奉清之正朔,承认清国的宗主权,双方往来礼仪一如明制,并上缴明朝所赐的诰命印册,去明国之年号,与明朝断绝往来。^② 每年圣节、正旦、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进贡钁额的金钱财物粮食。^③ 为了确保朝鲜的忠诚,朝鲜必须以世子、宗亲、大臣子弟作为人质,一旦朝鲜国王敢私通明朝,或朝鲜内部有变,清国将行废黜、改立质子即位。^④ 至于出降仪式,朝鲜国王为求国祚延续,不再争论礼仪问题,一切听任清使安排。清使英俄尔岱要求朝鲜国王出降时,不得穿袞龙服,改穿蓝衣,不得由南门出、改走西门,骑白马、尽去仪仗,并率昭显世子、凤林大君、麟坪大君及文武群臣五十人,步行至汉江东岸三田渡地方向皇太极投降。^⑤ 当朝鲜君臣出城候迎时,清军列旗纛、吹喇叭唢呐、张黄屋列仪仗,军士皆披甲列队。在朝鲜君臣看来,清军的阵仗“略仿华制”^⑥,兵马雄壮、号令严明,令主战派无不气夺而色沮。比照过去的江都之盟、平壤之盟,三田渡的受降仪式虽有拜天的环节,但没有刑牲皂血的仪式,还有朝鲜君臣伏地请罪、行跪拜礼的动作,表示萨满信仰的影响渐小,而以“礼”为中心的名份秩序观影响渐大。

三田渡之盟的缔结,象征朝鲜与清国由兄弟之国的对等关系,变为君臣之国的不对等关系,从而确立了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在遣使进贡上,朝鲜必须遵守三田渡之盟,以臣属身份进贡清国,朝鲜使臣的行礼动作让清、朝两国再次确定宗藩关系的建立,而清国透过接待朝鲜使臣,学习明朝接待贡使的相关仪式,也特别注意朝鲜是否比照明制接待清使,否则就是蔑视清国,视同渝盟。

韩兴一以礼曹言启曰,清使出来,凡干接待之礼,自当照例施行。但七处迎慰,虽不可废,至于结彩、杂戏、用乐等事,则似难尽照。前或独安州、平壤、黄州三处为之。所经一路,馆舍支持等事,观其被兵激甚,随力整备,俾不至大段埋没而已,京中轩架,已为榻前停当。此虽似浮文,所系亦重,似不可已,而议者多言,轩架浮费甚广,只设结彩戏不为当云,敢为申禀,以候睿裁。传曰,问于大臣定夺。^⑦

不管朝鲜是否真心臣服清政权,但从皇太极关注朝鲜是否依敕使规格去款待清使的问题,可知崇德年间的清政权已有与明朝一争天下的准备,并把朝鲜作为练习对象,间接学习明朝统治属藩的经验,塑造出天下共主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在朝鲜君臣询问谢恩使李圣求的对话里,也反映了清国依照明制、要求朝鲜贡使行四拜礼之外,还要求朝鲜贡使行女真旧俗的三叩头礼。而当时接待朝鲜贡使的礼部译官张礼忠,自诩“中朝之礼,我无不知”,遂可推论清国在宾礼仪式上确实以明朝礼制为行礼范本,用以判断朝鲜是否效忠清国、遵守三田渡之盟。

上召见谢恩使李圣求等曰:“彼中气色如何? 待之亦如何?”圣求对曰:“臣等留馆四十日,而二十日前则不得出入,其后始相接,而未能详知其事情。初甚盛气相对,而终则渐似和平,然四拜之礼,则必使之矣。”上曰:“我国使臣之入于中朝也,亦行四拜之礼于礼部乎?”圣求曰:“张礼忠以为中朝亦然。彼辈亦曰‘中朝之礼,我无不知’云。”都承旨金寿贤曰:“我国使臣赴京之礼,则肃拜时五拜,礼部则四拜矣。”上曰:“有叩头之礼耶?”圣求曰:“三叩头矣。”寿贤曰:“中朝则尚书坐而受拜,郎中与使臣抗礼,于书状则揖而已。”上曰:“分东西而坐耶?”圣求曰:“初见时则彼辈主壁,而其后则分东西矣……第贵去奏文终不得呈进,不胜惶恐。奏文中措语,只举分义,不论事势,实恐彼之发怒,故越越而竟不敢耳。”^⑧

朝鲜君臣问四拜礼、东西分坐等事,即观察清国是否以明朝礼制款待使臣,并指出明朝礼部尚书坐着受朝鲜使臣行拜礼,郎中与朝鲜使臣位阶对等、互行拜礼,而朝鲜使臣对书状等译官只需行揖礼,而清国礼部官员张礼忠竟让朝鲜使臣行三叩头礼,暗示使者大受折辱、未能得到像明朝礼遇使臣一样的待遇。

三、朝鲜事大政策的分裂

①[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4,第22页b;[韩]成百仁:《三田渡碑满洲文》,《东亚文化》1970年第9期;陈捷先:《三田渡满清太宗功德碑研究》,载《满学研究(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151页;金在善:《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韩]郑昌顺等编纂:《同文汇考》第2册,珏庭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8页。

③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13-14页。

④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69页。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承政院日记》卷55,第58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42-243页。

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4,第23页a。

⑦[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承政院日记》卷59,第3页。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35,第9页b。

皇太极迫使朝鲜屈服,使其不敢再潜通明帝国,^①切断朝鲜与明帝国的宗藩关系,但朝鲜始终未能真心臣服清国。为了消除朝鲜抗清斥和势力,清国要求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朝鲜君臣筹划缚送方案,并希望斥和首倡者自首,遂下达自首令,而金尚宪(1570—1652)、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11位朝鲜官员请行清国,甘愿赴死。^②仁祖李倧大惊,并怒言“谁为此令者”^③,最后迫于清军的压力,也为了保护朝鲜反清领袖金尚宪、郑蕴,只好指定司宪府掌令洪翼汉、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出首,^④使三人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崇祯皇帝特别褒奖斥和三学士,“为营生祠亲祭”^⑤,仁祖也特赐月廩给三人遗孀,^⑥朝鲜官民更为推崇,将斥和三学士被看成朝鲜“尊周思明”的象征,表现朝鲜士人忠于明朝、维护纲常的气节:

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履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⑦

有别于朝鲜士人的极高评价,朝鲜君臣则将朝鲜破坏盟约的责任归咎于斥和三学士,使朝鲜得以避开皇太极进一步的问责,保全朝鲜的国祚。由此可知,斥和三学士的牺牲,凸显了朝鲜对清政策在现实政治与道德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朝鲜政府选择斥和首倡者的人选问题,也凸显了朝鲜内部的党派倾轧与君臣间的紧张关系。

清军入关、粗定天下后,顺治皇帝(1638—1661)采取“字小以仁”的态度,频频优礼朝鲜,赐予朝鲜使臣班行、座次都在各国使臣队伍的首位,^⑧试图缓和与中朝两国的矛盾,并为清帝塑造“德治”和“礼治”的形象,奠定了清帝国与朝鲜往来的基本姿态。朝鲜虽延续事大政策,向清政府派遣三节使团,赴北京朝贡,^⑨但仁祖李倧仍旧鄙视清政府,并未因清军入主中原就改变态度,始终不认同清帝国的“天朝”身份,否认其中华正统地位,常常对清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有人怀疑仁祖暗中下令毒死昭显世子(1612—1645),只为延续朝鲜仇满斥和的姿态,不愿让亲近清政府的昭显世子即国王位,^⑩可见“华夷观”对朝鲜产生的巨大影响。正是在“华夷之辨”的政治文化下,曾送往清国为质的孝宗李湔(1619—1659,即凤林大君)即位后,积极部署军事,准备“北伐”中国,并密切注意南明、日本及郑氏政权的情况,希望能联合这些反清势力,共同反抗清政府,推翻这个由蛮夷建立的政权。

除了孝宗李湔积极准备“北伐”,密切注意南明、日本及郑氏政权的情况之外,朝鲜消极抵制态度也表现在接待清使的仪式上。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虽持续了200余年,但只有仁祖朝曾制作有关迎接清使方面的仪轨,比起迎接明使的仪轨章数大减,制作简略粗糙,而其他国王在位时期皆不制作迎接清使的仪轨、只制作实务所需的誊录、册子,^⑪可见朝鲜不愿意留下隶属于清朝的记录及其对清朝的轻蔑态度。观察仁祖时

①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96页。

②[韩]黄景源:《江汉集》卷27,《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第29页。

③[韩]黄景源:《江汉集》卷27,《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24册,第29页。

④[韩]尹拯:《明斋遗稿》卷32,《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36册,第173页。

⑤[韩]吴达济:《忠烈公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9册,第62页。

⑥[韩]洪翼汉:《花浦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22册,《首尔市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第411页。

⑦[韩]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载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

⑧徐浩修:《燕行纪》卷2,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17页。

⑨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⑩载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82页;王阳:《清崇德年间朝鲜质子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贾桂:《仁祖国王时期朝鲜对政策研究——以调粮令与世子猝死事件为中心》,《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⑪以光海君时期迎接明朝使臣为例,可知朝鲜迎接明使时,必须设立总管全部事宜的都厅,还要设置军事上辅助迎接使臣的军色、为使臣采办礼单上的物品及所求物品的应办色、为使臣准备宴会的宴享色、为使臣准备主食的米面色、为使臣准备菜肴的饭膳色、为使臣准备茶点的杂物色。按惯例,都厅与六色皆须分别制作仪轨。

期接待清使的史事与相关仪轨来看,可知朝鲜常不满清使随意勒索、不听国王谕令的行径,^①但还是不敢违反三田渡之盟,尽量比照款待明朝敕使的规格,朝鲜君臣仍行“郊迎礼”^②,安置于慕华馆(位于西大门会贤坊,原名南别宫),^③并先后举办八次宴会接待清使。宴会上,仁祖坐西面东,清使则是坐东面西,双方西、东相对而坐。^④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待明使、清使的礼仪看似相同,但行于国王与使节之间的“茶礼”,却被无声无息地改动了仪式细节,象征朝鲜与明、清两代的关系变化。^⑤

根据朝鲜王朝修纂的基本礼典《国朝五礼仪》(1474年修成),可知朝鲜接待明使、行茶礼仪式时,朝鲜国王居西位,是为主位,明使居东位,是为宾位;再从两者坐椅的材质(国王坐朱漆交椅,明使坐乌漆交椅)、在旁捧茶果的官员位阶(服侍国王者是从一品的提调,服侍明使者是正三品司瓮院提举)、服侍官员进茶钟的举动(对国王是跪进,对使者是立进),可见两者仍有尊卑位阶之分。^⑥《国朝五礼仪》规定款待邻国使者,国王不必出席接待邻国使者的宴席或茶礼。金国与朝鲜乃兄弟之国,照理应用款待邻国的礼仪,但因金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朝鲜国王李倬特别为金国使者举行了茶礼,获得的礼仪规格比起“邻国”来得优遇。^⑦1637年朝鲜成为清国的属藩后,朝鲜仍沿用金国时期的规格,并未使用款待明使的规格。^⑧而朝鲜款待金国使者举行的茶礼,即后来款待清使“下马茶礼仪”的前身。

金堉以礼曹言启曰,以昼奉杯上马宴饯宴仪注,传曰,通事立进茶钟前例耶事,传教矣。自前诏使时,自上亲宴,则有跪进节次,而宰相则皆以立进,载在五礼,故去丁丑以后,接待清使时仪注,皆以立进磨炼矣,敢启。传曰,知道。^⑨

朝鲜款待清使的“下马茶礼”,侍奉国王和清使皆是正三品的提调,提调进茶钟皆以跪进,容易让人以为清使与朝鲜国王居于对等地位,似乎比款待明使的规格更高,但从茶钟盘是否由国王亲手传递给使节的细节,可知朝鲜接待清使时,朝鲜国王、正使、副使三者不互递茶钟盘,其享用过的茶钟盘各自撤出,并不像过去接待明使那样主客尽欢、强调亲睦,同时从清使不从国王手上、改从提调手上接过茶钟盘,亦可见朝鲜对清使明尊暗贬、不屑共食的伎俩。由此可知,所谓的“优待清使”只是朝鲜欺瞒清朝的巧妙说法,这也反映了朝鲜视清帝国为夷狄所表现出的自负自信与文化优越感。

1674年朝鲜肃宗李焞(1661—1720)即位,清帝国正好发生“三藩之乱”。吴三桂(1612—1678)等三藩藩王提出“兴明讨虏”的口号,联合台湾郑氏政权共同起兵,使朝鲜君臣大为兴奋,以为“反清复明”有望,派出密使大量搜集有关清军作战的情报,并担心清帝国可能向朝鲜借兵借铙,朝鲜将陷入听命与否的两难。若朝鲜选择协助清军,就是违反“尊周思明”的大义,朝鲜君臣将不容于士人的悠悠之口,台湾郑氏政权可能也会联合日本、攻击朝鲜,但朝鲜若不协助清军,可能会受到清帝国的责罚,甚至重演清军蹂躏朝鲜“丁卯虏祸”的悲剧。^⑩

领议政许积曰:“若只求军器,则无辞可防,固当从略给之,至于请兵,则事甚难处。椴岛、锦州之役皆送兵,此则出于万不获已,犹有可诿。今者吴三桂拥立崇禎之子,再造大明,我乃兴兵助伐,非但义理

①[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49,第7页a。

②李花子:《清代朝鲜的迎敕礼:以国王郊迎为中心》,《欧亚学刊》2006年。根据李花子的整理,可知康熙初年,中朝双方屡争执国王是否郊迎敕使问题,清使认为朝鲜国王不能像蒙古王公入朝拜谒,那郊迎礼中的迎敕和受敕是朝鲜国王必不可少的大事仪式,用以提醒朝鲜的臣属身份,强化中朝两国宗藩关系。但朝鲜显得十分不情愿,常常找各种理由推托郊迎礼的举行。

③[韩]朴容大:《增补文献备考》卷177,汉城古典刊行会1958年版,第5页b;[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敕使誊录》,载《各司誊录》第90册卷7,京畿道国史编纂委员会1997年版,第446—447页。

④[韩]韩永愚:《朝鲜王朝仪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⑤[日]筱原启方:《朝鲜王朝的茶礼——明·清使への宾礼を中心に》,《周缘のシリーズ1:东アジア茶饮文化と茶业》2011年第1期。

⑥[韩]申叔舟等编:《国朝五礼仪》,载《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第6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据朝鲜后期刊本影印,卷5,《宾礼·宴朝廷使仪》,第506—509页。

⑦[日]筱原启方:《朝鲜王朝的茶礼——明·清使への宾礼を中心に》,《周缘のシリーズ1:东アジア茶饮文化と茶业》2011年第1期。

⑧韩国奎章阁图书所藏番号:想白古394.4-0435,转引自[日]筱原启方:《朝鲜王朝的茶礼——明·清使への宾礼を中心に》,第65—66页。注意:此资料有误本,详见筱原启方一文注29的考证。

⑨[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承政院日记》,卷72,第10页,仁祖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⑩参见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樊延明:《论“三藩之乱”时期朝鲜与清朝关系》,载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柳岳武、赵鉴军:《康熙朝清韩宗藩关系》,《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魏舶:《“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遣清使研究——以朝鲜使者归国汇报的偏见为中心》,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之所不忍为,虽以利害言之,清国之势,似难久保。大明兴复之后,若有问罪之举,则无辞自解。若虑此不从其请,则清国虽疲,制我则有余。以数万兵侵軼我疆域,则将何以待之……可以观天下形势而处之。”……知事柳赫然曰:“夏间敕行其来甚急。先朝虑有请兵之举,问臣以海西兵额,而有许给之意矣。吴三桂举事,名正言顺,我当乘此机会,以雪丙丁之耻,而乃反送兵助伐乎?但不从令,则便是生衅,自量兵力,后可为之耳。”^①

面对群臣的议论纷纷,即位不久的肃宗李淳更看重现实利益,认为朝鲜实力远不能与清帝国抗衡,一旦举起北伐反清旗帜,朝鲜将遭灭顶之灾,并以“壬辰之恩、丙子之辱,岂不日夜感泣切齿哉?为其时势之不适,吁亦惜矣”^②等语,回应士人请求北伐的建议,最终朝鲜不敢轻举妄动,停止了北伐的行动。附带一提的是,除了朝鲜密切注意当时战局之外,日本也透过中国商人提供的情报,观察“三藩之乱”的军事进展,并分析清帝国维持政权的可能性,可见“三藩之乱”对东亚各国引起的影响。^③

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④此时正是考验清军平定“三藩之乱”的重要关头。清政府刻意拉拢朝鲜,避免朝鲜反清,刻意优礼冬至使瀛昌君李沆、副使沈粹等人,令左右厨房备供饷,并下令整改朝鲜使臣下榻的玉河馆,还送还两起方物,皆是清帝对朝鲜使臣前所未有的优礼。^⑤对此,书状官万进雄向肃宗分析“三藩之乱”的各种情报,认为康熙皇帝优礼朝鲜使臣的真正原因,乃是清军的军事行动陷入胶着,故稳住朝鲜,避免朝鲜倒向吴三桂建立的汉人政权。

以吴三桂事,问于门将,言三桂方在长沙,头发已长,衣冠比汉制,虽有百万之众,率多乌合。但手下有五六千敢死之兵,即所谓苗奴也……清人四亲王十大将,率八万兵,方为犄角,而上年粮绝,人相食,猎獐鹿,并其毛食之。清皇命勿添兵,待民力之稍苏。且言三桂地险兵利,坚壁不出,今无可奈何。自甲寅以后,南征之兵至于百二十万,时存征成者,仅八万。三桂改国号周,称重兴四年。云南、贵州、四川、汉中、湖南诸邑,皆用重兴通宝。^⑥

由于朝鲜贡使团对“三藩之乱”的报告与分析,再加上东莱府使也想办法打探倭馆的消息,得知郑经因台湾内乱、大陆兵败,不得不弃守厦门、退回台湾的情报,^⑦所以朝鲜君臣的态度也从蠢蠢欲动到按兵不动,仍选择效忠清政府,继续执行事大政策,不因吴三桂恢复汉人衣冠、转而支持吴三桂,而是暗自庆幸当初自己没有轻举妄动,不然就误信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口号,当了僭越者吴三桂的同谋。^⑧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台湾郑氏势力也被扫除,清政府彻底控制中国,呈现大一统的局面,于是转向文治,对内提倡“满汉一体”,对外推行“礼治”,尤其优待朝鲜,或免朝鲜贡物,或关心使臣起居、提供后勤保障,或赐礼物、屡有恩典,或宽容其文书失误,或无偿救助朝鲜漂流人,送其回国。^⑨康熙皇帝优待朝鲜的表现,竟让一向轻视清帝国的朝鲜心怀感谢,赞其为“朝鲜皇帝”,^⑩可见康熙皇帝怀柔远人的统治之术。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国不是只靠一味怀柔、厚往薄来就能争取到朝鲜的臣服,还必须依靠名分礼教与军事实力的双管齐下,方能镇摄朝鲜,使其谨守君臣名分,执行事大政策。例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沟事件”的发

①[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1,第26页a。

②[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3,第34页b。

③“三藩之乱”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学者林春胜编辑历年留存的中国风说书,并将该书命名为《华夷变态》,留下许多中国亡佚史料,例如吴三桂起兵反清的檄文便收录于《华夷变态》与《朝鲜李氏王朝实录》之中,却不被清朝官方档案所收录。参见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仲光亮:《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以〈华夷变态〉中的风说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

④滕绍箴:《三藩史略》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4-1236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7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a。

⑥[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7,第7页b。

⑦[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9,第66页b。

⑧葛兆光:《吴三桂非姜伯约: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载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6-91页。

⑨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10、116-117、268-269、282、316-317、359-360页。

⑩[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景宗实录》卷10,第29页b。原文为泰甯曰:“胡皇意外丧逝,讣救将至。西路游飢,客使压境,其忧诚不细矣。臣于昔年,奉使燕京,闻彼人称故胡皇,为朝鲜皇帝。盖以胡皇,顾恤我东有别故也。”

生,^①清政府抓住时机,惩治朝鲜,借以提醒朝鲜臣属身分,严令其恪守事大之礼。于是礼部派遣敕使赴朝鲜调查,准备察议肃宗李焞,最后肃宗不得不卧床装病,宣读谢罪文,缴交罚银2万两,而放铤肇事的6名朝鲜人被处斩,19人被流配,咸镜道观察使、节度使以下官员被降职、流配。当朝鲜使臣抗议礼部惩处太重、折损国王颜面时,礼部则指责肃宗李焞昏懦,以致臣下恣肆,并批评朝鲜多位国王长期怠慢郊迎礼等事大礼仪,有损清朝皇帝的天威:

朝鲜奉大国之声灵,安居旻谷之域,当念累朝兴复之殊恩,抚循之至德,恪守藩翰,夙夜虔共,庶无陨越,以滋咎戾。顾乃其君昏懦,其臣恣肆,玩愒骄惰,习以成风,弃礼忘恩,非惟一事。臣等每闻使臣至彼,不遵先年所定仪注,其国王或迎而不见,或偃蹇不迎,天威咫尺之义,谓之何哉?^②

礼部严词责问之下,朝鲜君臣无不股栗,一改怠慢清使的态度,遵行各项事大礼仪,并严格管理边民越境的问题,避免“三道沟事件”的重演。此后,当清使持敕书到来时,朝鲜国王必履行事大礼仪,亲行郊迎礼、郊送礼。为了回应朝鲜谨守事大礼仪的种种表现,康熙皇帝亲赐御书条幅给朝鲜,手书“藩封世守,柔远恪恭”八字,以示恩宠,而朝鲜君臣却仍称康熙皇帝为“胡皇”,并视接待清使为苦,嘲讽清使诗文不通,屡多不满之语,^③可见朝鲜着眼现实政治,作为清帝国属藩,执行事大政策,但在朝鲜君臣的对话里却仍贬低清帝为蛮夷之君,清使皆骄傲自大、不知礼仪者,借以抒发朝鲜无力北伐、不得不臣服清帝的无奈,不啻为一精神胜利法。

四、朝鲜文化认同的重构

当清帝国收回台湾、底定天下后,朝鲜不再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清帝国与朝鲜的关系随即缓和。清帝国以正统自居,朝鲜则以“事大主义”自慰,中朝两国很快重回宗藩关系的发展轨道上,但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仍不同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朝鲜贡使团记录《朝天录》和《燕行录》的命名,可见朝鲜只认同清帝国是“大国”,而非“天朝”。^④与此同时,朝鲜官民对故明的眷恋之情仍时时流露,并以为朝鲜有责任保存明室之遗绪,进而攘除戎狄、肃清中原、恢复中华。

崇祯十七年,毅宗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礼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之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⑤

“华夷之辨”思想深深影响朝鲜士人的“中国观”,使朝鲜君臣先以“以夷变夏”认定先王礼教已变为胡环,唯独朝鲜能保存“中华”旧制,再加上怀念万历皇帝的恩德,朝鲜始终尊明,坚守程朱理学,并建大报坛和万东庙,坚持用崇祯纪年,^⑥从而透过“尊周思明”的表现,自诩为东海君子国的形象,借以抬高自身的地位,间接划定了“我者”与“他者”的边界。^⑦例如,从朝鲜士人假借“天朝大元帅”的名义,伪造故明檄文告示,偷偷在延恩门张贴檄文,文中指责朝鲜君臣忘恩负义,竟向蛮夷之主屈膝跪拜,甘受臣妾之辱,并要求朝鲜切断与清帝国的宗藩关系,举兵反清,为大明报仇雪恨。

眷兹藩邦,皇朝之礼待不薄,念我万历皇帝,命将犖财,惠此东方,恩泽罔极。宜尔三韩君臣,铭骨镂心,至于后昆,感戴无疆,而夫何屈膝于凶奴之庭,甘心于臣妾之辱?若曰强吞弱肉,不得已降附,容或然耳,至于助攻天朝,忍为此凶逆,于汝安乎?且夫降虏元帅,罪浮于陵,而竟贷缺钺之诛,卖主谋臣,恶过于桀,而反侈旗常之宠,其曰惩恶之有截,可见讨罪之不严。^⑧

对这篇檄文,朝鲜君臣闭门讨论,并根据“降虏元帅,卖主谋臣及大报新建等说”,判断这篇檄文是伪造之作,只为了批判政府的事大政策,可能会惑乱人心,故下令捕厅、三军门及汉城府尹秘密缉察,不得誊传于外,引起士林借机抗议。

①李花子:《17、18世纪中朝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载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13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7页。三道沟事件为1685年朝鲜西北边民数十人越境采参,与受命绘制舆图的清朝官兵发生冲突,造成数名清朝军官中弹受伤,朝鲜民众一人死亡,数名受伤的越境事件,引起清政府的重视,立刻问责朝鲜君臣,遣使交涉。

②[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原编卷51《犯越》,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版,第26页。

③[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38,第60页a。

④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⑤[韩]朴趾源:《热河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3册,第250-251页。

⑥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115-131页。

⑦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第122-131、226-256页。

⑧[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50,第22页b。

朝鲜以礼乐教化的“华夷之辨”，区别“我者”与“他者”，强调朝鲜代表“中华”的优越地位，并视清帝国为“猾夏蛮夷”^①，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拒绝与蛮夷往来交流。不过，朝鲜的文化边界意识虽仍取自儒家思想资源，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或民族主义，但在中华世界秩序体系里已具备了“内外有别”的性质，使朝鲜能透过比较的手段，凝聚朝鲜对自身的认同感。因此，当朝鲜接受清帝国的宗主国身份后，朝鲜的事大政策也从一味排拒、无奈接受到积极向清帝国学习。但这不代表朝鲜认同清帝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朝鲜的事大政策仍是政治与文化各自为主，“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②，形成了朝鲜对华观的两重性。康熙中期以后，康熙皇帝（1656—1722）、雍正皇帝（1678—1735）屡屡优礼朝鲜使臣，蠲免贡物，^③而乾隆皇帝（1711—1799）更首开皇帝赐宴朝鲜使臣之例，亲自接见朝鲜使臣，允许朝鲜使臣“以外藩陪臣，得厕朝臣之末”^④，甚至还召见朝鲜使臣，“引至御榻，馈以御酒”^⑤，令朝鲜使臣受宠若惊、不再视出使中国为苦差事。以后的清朝皇帝也继续优礼朝鲜政策，如咸丰皇帝（1831—1861）便学习康熙皇帝的做法，向朝鲜国王颁发御书匾额“海邦屏翰”^⑥，便可见清政府对朝鲜之重视程度。

由于清政府刻意优礼朝鲜、多次蠲免，再加上清帝国国力强盛、文风鼎盛，朝鲜也意识到“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再加上朝鲜国王屡困于朝鲜两班贵族的党争冲突与经济特权，^⑦所以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清帝国，争取清帝国在经济上的支援。^⑧ 朝鲜英祖李昉（1694—1776）着眼现实利益，欲援引清帝国为外力，压制两班贵族，故对清使态度较为灵活、极尽接待之礼，也不再称清朝皇帝为“胡皇”、改称“皇帝”。^⑨ 幼年失怙的正祖李祘（1752—1800）常有朝不保夕之感，更懂得事大政策的重要性，对清使更是敬谨有加，并刻意向臣民展示王妃、王世子的册封仪式，^⑩有助于提升王权权威，巩固朝鲜王室的地位。然而，从朴趾源分析朝鲜与明、清帝国的关系，可知朝鲜对清帝国在政治上的依赖与文化上的认同是两回事，其源由来自于“中华”的判别，而“中华”的判别却来自“王霸之辨”，显示华夷观的影响逐渐减弱。

嗚呼！皇明吾上國也……何為上國？曰中華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蓋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今清，按明之舊臣，一四海所以如惠我國者，亦累葉矣。金非土產則蠲之，彩馬衰小則免之，米、苧、紙、席之帑世減其數。而比年以來，凡可以出敕者，必令順付，以除迎送之弊……又詔永蠲正貢外，別使方物，此實曠世盛典，而固所未得于皇明之世也。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忱而不以榮者，何也？非上國也。我今稱天子所在之處曰行在，而錄其事。然而，不謂之上國者何也？非中華也。我力屈而服彼，則大國也。大國能力征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賜賚之寵，蠲免之諭，在大國不過為恤小柔遠之政，則雖蠲一貢，歲免一帑，是惠也，非吾所謂恩也。^⑪

通过朴趾源（1737—1805）的解释，可知朝鲜士人认为明帝国虽不像清帝国多有赏赐、屡屡优礼，但在朝鲜遭受攻击、即将亡国之际，万历皇帝（1563—1620）不惜倾全国之力，发兵救援朝鲜，兴灭继绝，以德服人者为王道，故明帝国代表“中华”与“上国”。而清帝国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开始便凭借武力，以力屈人，迫使朝鲜不得不背叛明朝，后以利诱人，假行仁义，对朝鲜多施小惠，不过是霸道，故朝鲜只能承认清帝国的“大国”地位，但不能认可其代表“中华”。此外，朴趾源对明清帝国的解释，可知朝鲜虽不再贬斥清帝国为蛮夷，但仍夹杂着清兴明亡的无力无奈，也可窥见朝鲜否定清帝国等于“中华”之余，更多流露出的是朝鲜代表“中华”正统的优越感。

透过朝鲜使臣在《燕行录》写下的游历心得，可见朝鲜士人在政治归属与文化认同上的矛盾心态。这些

①[韩]成佑曾：《茗山燕诗录·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9册，第199页。

②[韩]李在学：《燕山纪事·利》，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77页。

③[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实录》卷11，第45页b。

④《清高宗实录》卷20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b。

⑤[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15，第27页a，正祖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⑥《清文宗实录》卷8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b。

⑦李岩：《朝鲜朝中期四色党争的文化性格》，《韩国学论文集》2013年版，第75—81页。

⑧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114—154页。

⑨[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实录》，卷69，第41页a，英祖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孙红英：《清朝前期朝鲜的对华观——〈朝鲜王朝实录〉为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18，第9页a。

⑪[韩]朴趾源：《热河日记》卷16，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558—560页。

朝鲜士人的矛盾心态,来自于现实与理想的分化,使朝鲜事大政策的分裂,加深其在文化认同的成见,而这些成见又导致了朝鲜故步自封,谨守程朱理学,阻碍了朝鲜吸收中国“乾嘉之学”的可能性。随着清帝国国力强盛与文化发达,朝鲜内部也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声音。“北学”一词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的楚国人陈良崇尚周公、孔子之道而北上求学,以图“用华变夷”^①,故这些主张学习中国文化的朝鲜士人被称为“北学派”。“北学派”代表人物洪大容、朴趾源等人都有随同贡使团、游历北京的经验,亲眼见到清帝国“人物之繁盛,才器之卓越,物产之殷阜,非我国之比”^②,认为朝鲜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积极与清帝国交流,吸收新文化新技术,尤其是清代江南的礼学成果与文化优势,使朝鲜士人感到朝鲜礼学的不足,“然嗣后说礼者,莫不师承紫阳而宗之,本旨不敢移易。徐昆山乾学有《读礼通考》,万斯同有《五礼通考》。汇古今以礼为名者,及于外夷,洋洋大观也”^③。因此,洪大容提出“华夷一也”的观点,认为世界不应有华夷之分和内外之别,“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亲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④,并批评朝鲜囿于“尊周思明”的正统名份,守旧于程朱理学,使朝鲜故步自封,无法吸收中国新兴思想与学术成果,从而奠定朝鲜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破除了朝鲜向清帝国学习的矛盾心态与思想包袱,使朝鲜实学思想逐渐替代“小中华”思想。^⑤

随着朝鲜与清帝国的往来日益密切,屡屡优待朝鲜,朝鲜逐渐认同清帝国的宗主地位,“反清复明”的理想已是昨日黄粱,只剩遵循明代礼制、着明朝冠服及大报坛的祭祀象征“一隅海东,大明尚存”的缅怀故明之情。^⑥ 朝鲜与清帝国的关系改善,为“北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而“北学派”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朝鲜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认同感。^⑦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北学派”学者虽主张学习清朝文化,但不认同清帝国是“中华”正统,也不把清帝国视为“上国”,清帝国赐予朝鲜的种种优礼不过是小惠、而非特恩。尤其从朴趾源虚拟《许生传》的朝鲜策论之中,窥见朝鲜“北学派”士人鼓吹向清帝国学习的真正动机。

今满洲遽而主天下,自以不亲于中国,而朝鲜率先他国而服,彼所信也。诚能请遣子弟入学游宦,如唐元故事,商贾出入不禁,彼必喜见其亲而许之。妙选国中之子弟,剃发胡服,其君子往赴宾举,其小人远商江南,覘其虚实,实结其豪杰,天下可图,而国耻可雪也。求朱氏而不得,率天下诸侯,荐人于天,进可为大国,退不失伯舅之国。^⑧

“北学派”的主张虽打破了朝鲜的文化保守主义,象征着朝鲜事大政策的裂痕逐渐弥合,但在本质上仍是将清帝国视为值得学习的敌人,其实质在于富国强兵,希望消除“华夷之辨”的偏见,打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壁垒,向清帝国吸收新知新学,改革朝鲜时弊,并观察清帝国之虚实,结交其豪杰志士,再图恢复天下、洗刷朝鲜国耻。或许对朝鲜来说,清帝国是一个绝对的“他者”。无论朝鲜主张或反对事大政策,也无论朝鲜褒扬或贬斥清帝国,“中华”都是朝鲜政治话语的核心语词,其终极目标即“天下可图,而国耻可雪也”^⑨,由此可见,朝鲜后期虽摆脱了传统的华夷观,不再贬斥清帝国及其文治武功,但朝鲜对中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仰视”、“俯视”到“平视”的过程,对自我认同更为强烈,甚至试图争夺代表“中华”的话语权,生出了与清帝国互争天下之心。

五、余论

明清易代引起的政治震荡,象征天朝崩解,使朝鲜不再视清帝国为“中华”与“上国”,逐渐貌合神离,也因“华夷之辨”解放了朝鲜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让朝鲜士人生出了与清帝国互争天下之心,争夺代表“中华”的话语

①崔一:《试析朝鲜的中国观》,《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韩]权时亨:《石湍燕记·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1册,第18页。

③[韩]李景圭:《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载《家礼辩证说》,第1051页。文出于“韩国文集丛刊数据库(DB)”: 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KO&url=/itkcdb/text/nodeViewIframe.jsp?bizName=KO&seoJid=kc_ko_h010&gunchaId=av016&munchId=02&finId=008&NodeId=&setid=3663300&Pos=0&TotalCount=1&searchUrl=ok。

④[韩]洪大容:《湛轩书》,载杜宏刚等主编:《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⑤[日]藤家邻:《李朝的学人と乾隆文化》,载帝京大学编:《朝鲜支那文化の研究》,刀江书院1928年版,第282-332页;姜日天:《朝鲜后期北学派实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⑥[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⑦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34页。

⑧[韩]朴趾源:《热河日记》卷10,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376页。

⑨[韩]朴趾源:《热河日记》卷10,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376页。

权。“华夷之辨”的边界,取决“中华”文明教化的动态界线,本是鼓励“以夏变夷”,让蛮夷慕化、臣服中国,但朝鲜的“华夷之辨”确有双重标准,即作为属藩的朝鲜,可“以夏变夷”成为小中华,但作为少数民族的清帝却仍旧是胡皇虜主,不可能成为朝鲜的“上国”,更不可能代表“中华”。清帝国虽采取“以夷变夏”的策略,展现强大的国力与文化资源,维持着中国与周边诸国的宾礼体制,但这些成就仍不能改变朝鲜士人“华夷之辨”的观念,也不能让朝鲜在文化上认同清帝国为“中华”,反而让朝鲜更加追求“礼教”的纯粹化,坚守程朱理学的圣人之言,借以自我标榜为“小中华”,暗示朝鲜全面继承了“中华”正统。正如清代东亚国际关系表里不一,朝鲜被迫臣服清帝国,却将事大政策分化为“一边事之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①,其事大政策不再是朝鲜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而是与清帝国互换利益的权宜之策。正因为朝鲜事大政策的分裂化,朝鲜内部发展出自尊自傲的文化认同,被视为蛮夷的清帝国只是大国,以力屈人,朝鲜着眼现实利益,勉强与之维持宗藩关系。

当清帝国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兴盛时,朝鲜君臣逐渐认同清帝国的宗主地位,而主张向清帝国学习的“北学派”也趁势而起,可以说是朝鲜在明清鼎革后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使中朝两国交流日趋密切,中朝宗藩关系也越来越稳固。但从朴趾源暗示“天下可图”一语,可知明清易鼎的世变,让所谓“天朝”名存实亡,以“中华”为主的文化纽带就此断裂,东亚诸国不再以清帝国作为中华世界秩序体系的中心,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只要有能力“以夏变夷”、教化诸国,自然有与中国争“天下”的资格。当清帝国衰弱后,朝鲜士人仍有人坚持“尊周思明”思想,主张北伐清帝国,“率十万之师,计复华夏而枭伪酋之首,揭示天下。求大明之裔,更继绝宗,更见天日之复明也”^②。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亚诸国近代化的原因不尽然是费正清等人主张的“外力冲击论”,而是东亚的近代化本就有其内在动因,却被隐于西力东渐的大潮之中,容易被人忽略东亚诸国在文化上渐行渐远的趋势。因此,朝鲜开关、列强势力进入朝鲜后,朝鲜“事大派”官员虽重视中朝宗藩关系,强调清朝与朝鲜是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但事大派领袖金允植也指出“今臣事清亦二百有年矣,其盛也,与之深好;其衰也,岂可无咫尺之书,以示共患难而全终始乎?”^③可见“事大派”主张维持宗藩体制,坚持向清帝国靠拢,并非认同清帝为天下之主,而考虑到国家利益,将中朝宗藩关系作为保护朝鲜的挡箭牌。

(责任编辑:陆影)

(上接第 171 页)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四、结语

《文心雕龙·时序》篇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和当时的社会状态相关。粗略梳理从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虽然是对同一篇文章的和作,却表现出种种不同的风貌、情趣。苏轼及其门人在困顿中走向精神自由,他们用佛、老思想消解身心难以调和的矛盾,也许无法像陶渊明那样真正归隐,却在心灵上效仿着陶渊明的自由解放,他们坚守着自己生命中仅存的高贵精神,在高雅的生活情趣里忘却世俗,否定宦海的尔虞我诈。南宋初期偏安一隅的政治状态及愈演愈烈的党争使部分文人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与勇气,和戎政策的确定打消了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政治积极性,他们不像苏轼那样直言抗拒,而是选择无视风雨飘摇的国势,企图在美好的乡居田园生活中避祸,过一种安稳自足的生活。而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也影响到了南宋初期的这批文人,他们中不少人见识鄙薄、文笔粗陋,以至于和陶辞中也出现了佛家教义堆砌成的篇章。高宗去世后,理学的发展也影响到和《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它们或宣扬理学的人生观,或憧憬着孔颜之乐,或表现乡居的美好和醇风俗厚人伦的使命感。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总是和时代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紧密相关的,从北宋后期和陶辞的大量出现以及此时期至南宋中期和陶辞的转变,我们同样可以验证这个结论。

(责任编辑:陆晓芳)

①[韩]李在学:《燕山纪事·利》,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77页。

②[韩]申箕善:《阳园遗集》卷17,载《汇言》。文出于“韩国文集丛刊数据库(DB)”: 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MM&url=/itkcd/text/nodeViewIframe.jsp?bizName=MM&seojiId=kc_mm_a659&gunchaId=av017&munchelId=01&finId=001&NodeId=&setid=3362994&Pos=2&TotalCount=4&searchUrl=ok。

③[韩]金允植:《云养集·云养续集》卷2,载《奉送臞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文出于“韩国文集丛刊数据库(DB)”: 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MM&url=/itkcd/text/nodeViewIframe.jsp?bizName=MM&seojiId=kc_mm_a650&gunchaId=bv002&munchelId=02&finId=002&NodeId=&setid=3356872&Pos=0&TotalCount=1&searchUrl=ok。